

## 《左传》“言语”对战国诸子散文的影响

戴伟华

我国散文源远流长，远在殷商的《尚书》，可谓散文之始。然其勃起，还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。历史散文，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，采集前史，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历史，《战国策》则记当世之事，保留了大量的战国策士言论；诸子散文，更是蔚为大观。究其原因，一是：时政衰微，礼崩乐坏，人的思想很少受禁锢，能畅所欲言；二是：士人企图推行自己的“道”，注意讲究文辞，言说事理。还有人把当时文学繁荣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经济的大发展，着眼于文学的外部规律，这无疑也是正确的。但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或某一阶段文学的勃兴，总有其内在因素，其兴衰流变也有其内部规律可寻。刘知几在《史通·言语》中曾论述战国前口语由浑朴而流婉、而谲辩的演变，给我们以启发。“夫上古之世，人惟朴略，言语难晓，训释方通。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，考文则词艰而义释，若《尚书》载伊尹之训，皋陶之谟，《洛诰》、《康诰》、《牧誓》、《泰誓》。周监二代，郁郁乎文。大夫、行人，尤重词命，语微婉而多切，言流靡而不淫，若《春秋》载吕相绝秦，子产献捷，臧孙谏君纳鼎，魏绛对戮扬干是也。战国虎争，驰说云涌，人持弄丸之辩，家挟飞钳之术，剧谈者以谲诞为宗，利口者以寓言为主，若《史记》载苏秦合纵，张仪连横，范雎反间以相秦，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。”其实，口

语和书面语是交互影响而发展的。从散文的发展看，《尚书》文字“佶屈聱牙”（韩退之语）、先秦诸子文章文词雅驯，这中间春秋“言语”起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桥梁作用，这里的“言语”，依刘氏之义，浦起龙释“谓口说之语”，而别于“行人辞令，”因为它包括一切人的口头语言。（诚然，先秦诸子文章从横的方面说必定受同时代的“言语”影响又当别论。）论春秋“言语”不是“文献不足”，特别是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是采集当时各国史料而成，为我们保存了丰富的原始材料。

### （一）

战国诸子散文受春秋“言语”的影响，其途径不外有二：一是直接观看各国史书，或据其所闻；一是览观《左传》所记。

《左传》成书于公元前四〇三年魏斯为侯之后，周安王十三年，公元前三八六年前（见《春秋左传注》前言）。即孔子之后，慎到、孟轲、申不害、吴起、商鞅、庄子、荀况、韩非之前。它在战国中广为流传，这已为史料所证明。

春秋以来，各国的执政者为了富国强兵，实行称霸，争相网罗人材，支持士人的活动，如鲁国季氏支持孔子讲学，魏侯文尊重子夏，齐威王、宣王建立稷下学宫，加上养士之风盛行，为学术的交流和发

有利的条件。《史记·田齐世家》描绘了稷下学宫的盛况：“宣王善文学游说之士，自如驺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子、慎到、环渊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赐列第为上大夫，不治而议论。是以稷下学士复盛，且数百千人。”这样盛大规模的学术活动，必然是学子云集。且鲁“周礼尽在”，又是孔夫子的家乡，象孟子生于鲁，且不论，其他学子，也会因齐鲁相近而去鲁观光，鲁史官所作《左氏春秋》为诸子所见，是很有可能的。

孟子为孔子以后儒学代表，他从《左传》征引对已有用的古史资料，不受拘泥，其实这也是春秋人言诗“断章取义”的流习。

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：

（齐侯）将遂伐晋。晏平仲曰：“君恃勇力以伐盟主，若不济，国之福也；不德而有功，忧必及君。”……齐侯遂伐晋，取朝歌，为二队，入孟门，登大行。

《晏子春秋内篇·问上》第二：

庄公将伐晋，问于晏子。晏子对曰：“不可。……今君任勇力之士，以伐明主，若不济，国之福也；不德而有功，忧必及君。”公作色，不悦……庄公终任勇力之士，西伐晋，取朝歌。及太行、孟门。

《晏子春秋》在引《左传》文时，易“齐侯”为“庄公”，晏子所言，差不多全袭于《左传》之文。

知《左传》所记乃春秋人“言语”之原始材料，战国诸子对此原始材料或亲见或耳闻，从《左传》诸子文章对读可知，因此，诸子受春秋“言语”，即受《左传》所记“言语”的影响是必然的、确信的。

## （二）

春秋“言语”载于《左传》，《左传》所记春秋“言语”，其特点为战国诸子继承并发扬光大，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。我

们有些谈论春秋、战国者，由于时代久远，忽视了时间上的概念，仿佛昨日是春秋，今日已成战国。其实，从周平王东迁到鲁哀公十九年，中间隔着二百九十多年。这么长的历史，在文学史上，特别是在散文发展史上，也只是轻轻提上一笔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。所幸的是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的记载，恰恰把这段漫长的历史整理得清清楚楚。《左传》所记录的“言语”和《诗经》一起反映了这个时期的“文学”特点。

《左传》是编年史，以记事为主，而它的叙事，那是史家绝唱，自不待言。单就“言语”而论，其“渊懿美茂，而生气勃勃，后此亦殆未有其比”（梁启超语）。春秋时人“言语”特点如何？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予以分析：

（一）擅长引用。春秋时期，由于诸侯相互攻伐，外交活动十分频繁，它要求人们在共同的交往活动中对言辞力加修饰，于是，他们就开始寻找现成的词汇来说明自己的观点，表达自己的意见。除引诗外，还引用典籍谚语，来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依据，重要的是引用大家熟知或尊为权威的东西，更能讲清楚某个问题，收到以一胜多的效果。

《成公八年传》：“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，归之于齐。季文子钱之，私焉，曰：‘大国制义，以为盟主，是以诸侯怀德畏讨，无有贰心，谓汶阳之田，敝邑之旧也，而用师于齐，使归诸敝邑。今有二命曰：‘归诸齐。’信以行义，义以成命，小国所望而怀也。信不可知，义无所立，四方诸侯，其谁不解体？诗曰：‘女也不爽，士贰其行。士也罔极，二三其德。’七年之中，一与一夺，二三孰甚焉？士之二三，犹丧妃耦，而况霸主？霸主将德是以，而二三之，其何以长有诸侯乎？诗曰：‘犹之未远，是用大简。’行父惧晋之不远犹而失诸侯也，是以敢私言之’。”汶阳之田原属鲁

国，后为齐所占，鞏之战，逼齐还鲁，现在晋侯要鲁把汶阳之地，还给齐国，鲁执政季文子两引诗对韩穿讲了一番道理。《诗·卫风·氓》句是说女子没有差错，始终如一，男子行为有过失，没有准则，前后不一。这里很恰切地说明了鲁恪守盟约，而晋朝三暮四，季文子并借题发挥，说男子行为不一，只不过失其配偶，而你晋国如此，就难保霸主的地位了，晓以利害，振衣挈领，切中肯綮。接着，季文子又引《诗》说明己意，《诗·大雅·板》句意谓谋略无远见，故我尽力来规劝，说明上言利害并非出于私心，只是为晋考虑而已。引《诗》得体，情辞婉转，很能打动对方。

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载，晋侯要出兵救宋，大夫伯宗劝说晋侯不要出兵，他引用古语，“虽鞭之长，不及马腹。”是说马腹不是鞭击之处，伯宗引此意在说明晋国力量虽强，也不能与楚争，言楚非晋争夺的对象，或解为“晋国不应长途跋涉去救宋，”乃以意为之，失其本旨。后引“高下在心”的谚语说明处理事务，或高之，或下之，唯我自我，相时而动也。伯宗很灵活地引用了古语，谚语，既注意君臣大体，又抓住要领，言简而意赅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。

春秋“言语”中所引用的有经典、有俚语、有诗、有文。据粗略统计，《左传》“言语”引《诗》一百零八，称《书》者五，《夏书》七，《商书》二，《周书》七，《康诰》二，《盘庚之诰》一，《大誓》三，《谗鼎之铭》一，《考父鼎铭》一，《前志》二，《周志》一，《军志》五，《郑书》二。它不包括“君子曰”引《诗》四十三，《夏书》三，《商书》三，称《书》者二，“仲民曰”引《诗》五，《夏书》一。此外还有赋《诗》六十九，其中歌《诗》一，诵《诗》一。另引古语十三，谚语十六。

尽管上述统计是疏略的，但可以看出春

秋时引用之风很盛，引用成了当时的“词令一法”。

(二) 援譬言理。春秋时人，爱用比喻，《左传》“言语”除明喻外，还出现了暗喻、借喻，喻体范围极为广泛，这同它记载了社会各阶层人物是一致的。

《左传·文公七年》：“鄆舒问于贾季曰：‘赵衰、赵盾孰贤？’对曰：‘赵衰，冬日之日也；赵盾，夏日之日也’。”鄆舒是赤狄潞氏之相，他问贾季，赵衰、赵盾谁贤明；贾季感到很难完整地回答，就用了两个比喻来答问，杜预注：“冬日可爱，夏日可畏。”这不光有形象性，而且囊括了比较丰富的内容。如此简单的问题，而很自如地用比喻应答，饶有意趣，春秋时人爱用比喻，由此可窥一斑。

春秋“言语”中，比喻极为丰富，形式多样。

有明喻。《哀公十九年传》：“小国之仰大国也，如百谷之仰膏雨焉。”以膏雨喻大国之恩泽，以百谷之仰喻小国向心之诚恳、急切。

有暗喻。如上文所引：“赵衰，冬日之日也。”

有借喻。《襄公二十八年传》：“得庆氏之木百本于庄。”《日知录》引邵国宝语：“此陈氏父子为隐语以相喻也。”木乃作屋之资，庄是京城大路，意谓庆氏必败，我可得人得权。

有单喻。如《襄公二十五年传》：“见不仁者，诛之，如鹰鹯之逐鸟雀也。”

有合喻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：“川泽纳污，山藪藏疾，瑾瑜匿瑕，国君含垢，天之道也。”这是伯宗说晋侯时所用之喻，以川泽可以纳污，山林藪泽可以有毒害者居之，美玉有瑕疵，比喻国君是可以忍受辱耻的，不能因小不能忍而危害社稷，应从长久计议。连用数喻，增强了言语的气势，具有很

强的说服力。还有的运用比喻，洋洋洒洒，简直有不可穷竭之势，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师旷答晋侯问：“……良君将赏善而刑淫，养民如子，盖之如天，容之如地；民奉其君，爱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神明，畏之如雷霆。”

春秋“言语”，比类连篇，层出不穷，喻以明义，譬而畅理，喻体不外山川草木鱼鸟兽，人所习见，皆为浅显通俗之语，众所能知，或有本体不露者，可谓寓言之初体，如《襄公二十四年传》：“大叔曰：‘不然，部娄无松柏。’”部娄者，小土山也。这里是说小土山不生大树，则小国不可与大国平行，这种借喻很值得注意，从这里可以窥见以后寓言的演进轨迹。

(三) 说理明晰，逻辑较严谨。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记载了有名的齐鲁长勺之战。战后，鲁庄公问指挥者曹刿胜利原因，曹刿从容应答：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夫大国，难测也，惧有伏焉。吾视其辙乱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。”从这段话中我们对曹刿其人可以得出三点：第一，判断的正确，说明曹刿对战争的熟悉了解，有作战经验，使他冷静地作出判断；第二，思维的周密，说明曹刿之所以指挥若定，是因为能够掌握薄弱环节，从最不利处作眼，这样思维才能周详严密；第三，观察的仔细，说明曹刿重实际，能相对而动，相机而行，观察比较细致、敏锐。曹刿虽是一个非“肉食者”，却代表了春秋一些人的风貌，从《左传》“言语”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论道说理的严密。

《烛之武退秦师》写烛之武深知己国力量弱小，要去秦国，只能从我之外找出口。他紧紧抓住秦晋之间的矛盾，先从地理形势上说明秦灭郑有害，导致“阙秦以利晋”，再从行李往来上说明舍郑之有益，于此又宕开一笔，举例说明晋实不可仰赖，与晋共事，

只有损害秦国。他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，已是周密，又引事实为据，更其严密，利害关系分析得透彻、深刻，终于达到秦罢其兵的效果。

诚然，春秋“言语”在论道说理方面还是简朴的，往往是先分后合，先分者或正反对比或相同并列。有的是层层推进，《文公七年传》：记录郤缺言归还卫地：“叛而不讨，何以示威？服而不柔，何以示怀？非威非怀，何以示德？无德何以主盟？子为正卿，以主诸侯，而不务德，将若之何？”后《孟子》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类此。

以上我们探讨了春秋“言语”的特征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其对诸子的影响。春秋“言语”的特征，是惯于引用，譬喻说理，说理时已具有相当的逻辑力量，尽管它还是简朴的。

### (三)

战国散文呈现鼎盛时期，这与春秋“言语”有无法割裂的联系，特别是诸子散文的发展繁荣，又是对春秋“言语”的文学特点的继承和光大。关于战国诸子文章的风格、艺术性，论述者甚多，此不赘言，独于春秋“言语”对战国诸子文章有影响者再言一二：

其一，春秋“言语”征引说理之风大行，诸子文章亦显具此特征。

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“齐桓晋文之事章”，齐宣王引《诗·小雅·巧言》：“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”说明孟子知其见牛发抖不忍杀之的仁爱之心。孟子引《诗·大雅·思齐》：“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”说明齐王应该以爱家人之心施恩于天下，如此方可保民而王。

荀子征引更甚，粗略统计，《荀子》一书凡引《诗》七十四，《传》五，《易》一，《书》十，《康诰》一，《秦誓》一。

不过到了战国，私家著述盛行，文词已成雅驯，故远“下里巴人”，《荀子》绝少引世俗谚语，似乎摆起了文人的架子。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民语曰：‘欲富乎？忍耻矣，倾绝引矣，绝故旧矣，与义分背矣。’”象这种用老百姓的话也不可多见了。

王力在《古代汉语》中说到古汉语的修辞：“战国时代，引经成为风气。《论语》引《诗》两次，引《书》两次；《孟子》引《诗》已达二十六次，此外还引《书》两次。《荀子》引经更多，引《诗》竟达七十次，另外引《书》十二次，引《易》三次，此外还有‘传曰’二十次。诸子当中，引经最多的是《荀子》。《墨子》虽不是儒家的著作，也引了几次《诗》《书》。”其实，不管儒墨，不管引经引传，引用是词令之法，如不守绳墨之庄子，亦引《齐谐》。

其二，比喻成为行文惯用的修辞手法，翻开诸子论著，触处可见。这时比喻又进一步扩大化了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“以若所为求若所欲，犹缘木而求鱼也。”齐宣王不能理解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”的抽象说理，孟子就打比方来说：“挟泰山以超北海，语人曰：‘我不能’。是诚不能也；为长者折枝，语人曰：‘我不能’。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这里，“孟子虚构了浅近的故事，一步步逼到齐王身上，叫他自己认罪，齐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；假使不用设喻的手法，直言指斥，齐王恼羞成怒，便失去了说服和讽刺的作用了。寓言是最有力的讽刺武器，更得到了证明。”（王焕镛语）（转引郑子瑗《论先秦诸子的修辞技巧》社会科学战线80年4期）可知故事、设喻、寓言在诸子文中，也是不好断然分开的。如《孟子》“全书二百六十一章，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，其运用比附方法以论述问题的竟达六十一一次之多，此外，其以古例今，象借文王、汤、武等而启示当时的，

尚未计在内。”（见侯外庐等《中国思想史》）战国诸子不仅喜用比喻，而且善用比喻，形式也较讲究，如《荀子·劝学》：“吾尝终日而思矣，不如须臾之所学也；吾尝跛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见也。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长也，而见者远；顺风而呼，声非加疾也，而闻者彰。假舆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绝江河。君子生非异也，善假于物。”“故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骐骥一跃，不能十步；弩马十驾，功在不舍。”多用排比句式，安设譬喻，既具体形象，又有气势，运用比喻又更加成熟了。

其三，在思维逻辑上，诸子把春秋“言语”的论证方法又推进一大步。他们的文章一般都长于论辩，擅于言理。《孟子》“齐桓晋文之事章”全篇只论证行仁政可以保民而王，文章纵横反复，而又层次清楚。首先，孟子避开齐宣王提出的“齐桓晋文之事”，正面提出保民而王的观点，再引齐宣王亲身所为，抓住“不忍其觳觫”的话和“以羊易牛”的事大加申述，下连设数喻，说明齐王可王，不王是不为也。文章至此似可结束，但孟子觉得言犹未尽，宕开一笔，挑起齐王的大欲，并论证其不能实现，当头棒喝，堵死齐王的后路，又从正面论述保民则可称王，最后使齐宣王只得俯首受教于孟子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。这种论辩，气势充沛，说理透彻深刻，是一种螺旋式的证论方法。

《庄子》散文说理时比物连类，从各方面来阐明自己的观点，洒脱飘忽，似乱非乱，细读《逍遥游》当能体会其论辩的逻辑特点。

《荀子》以严谨细密著称于诸子。如《解蔽篇》旁征博引，援譬言理，透彻淋漓。《韩非子》亦精于说理，逻辑严密，在论辩方

（下转第94页）

了秋天里的夏天。这是庐山留给我最初的印象，以后也被证实这正是庐山的性灵所在。过去人们熟悉苏东坡的名句：

横看成岭侧成峰，  
远近高低各不同，  
不识庐山真面目，  
只缘身在山此中。

今天看来，他只是说到庐山的形体美，而白居易的诗，则赋予了庐山以美的灵魂。

到庐山，没有不去游“仙人洞”的。我喜爱“仙人洞”，不只是爱它的云雾缭绕，飘然欲仙，尤其爱它的波澜壮阔，无限深邃。站在“仙人洞”极目望去，眼前一片碧绿的树海，其中很有一些松柏挺立在悬崖陡壁之间，枝伸虬展，袅娜多姿，凌空摆弄出生动的造形。但我还以为，庐山的美，不仅在于景，还在于声。夜晚，沿着林中小径，崎岖地攀上“月望松林”。山坡上，云雾蔽天，明月被遮住了，只见淡淡的一片白光和树林的黑影交错相间，整山个谷凝固了，沉浸在宁静中。但是，你听！一阵松涛声，由远而近，由小而大，象海浪翻滚，喧腾而来，一浪刚过，一浪又起，连绵不断，紧凑和谐，充分呈现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！

庐山之景，美不胜收。感谢主人的巧安排，次日清晨，我们登上“含鄱口”，爬上

“望鄱亭”。向前展望，壑谷幽深，远处阡陌连片，水道纵横，鄱阳湖静静地卧在淡淡的薄雾下，与天相接壤。“望鄱亭”两侧，左边是“五老峰”矗立，右边是“奇石峰”拱峙。可惜它们都被流云遮断，难见真面目。我们期待着。俄而，天空渐渐发亮，出现一线蓝天，慢慢扩展，终于将流云驱散，让“五老峰”和“奇石峰”登场：一个苍松碧翠，一个怪石峥嵘，山峰向前倾立，象要飞驾鄱阳湖上，而整个鄱阳湖水，被此二峰挟持，大有被一口吸干之势，真是气吞山河！难怪古往今来，有多少高人韵士，为之倾倒，为之讴歌啊！

短暂的局部览胜，最后又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到了庐山，就更体会庐山的美，顿感心胸开阔，杂念尽消。在仲秋季节来庐山游览，也算是个迟到者。但庐山仍然使我感受到夏天的炽热和生意。也许因为岁月易逝，人到中年，我对夏天怀有特殊的感情，特别喜夏，慕夏，惜夏。东坡有句“若到江南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”，仲秋庐山行，却要唤请你夏来同住了。同志，你没有游过庐山吗？秋天来，在这里你会受到欢迎，庐山的山水、云雾、气质、性灵，处处展示了祖国的山河美，它使你振奋，催你前进！

（上接第87页）

法上，变化多端，伸缩自如，有立论、有驳论，有问有答。推《亡征》、《显子》、《说难》为代表。

值得重视的是墨子。他的文章，讲究论辩的“三表法”，擅于引征历史和现实的材料来说明问题，据逻辑史家研究，墨辩的论式已经形式化了，在逻辑史上有杰出的贡献。

战国诸子受春秋“言语”的影响，是指其文学特点而言，并非言战国诸子文章某句似《左传》“言语”某句，若拘泥去解，则难免失之迂庸了。

综上所述，从《尚书》到战国诸子散文，春秋“言语”起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过渡作用。这以后，由于战国诸子继承并发扬光大，从而使我国散文史上出现了一个高峰。

（本文责任编辑 李华 黄南南）